

文史资料选辑

合 订 本

第20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 20 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抗日战争时期的“皖南事变”史料

- 顾祝同的反共军事阴谋..... 岳 星 明(1)
- 上官云相袭击新四军的经过..... 武之 棻(9)
- 蒋军第四十师袭击新四军的经过..... 陈士 章(27)
- 蒋军第一〇八师袭击新四军的经过..... 周祖 尧(36)

解放战争时期的湖南起义史料

- 我参加湖南起义以及同白崇禧周旋的经过
..... 唐 星(40)
- 追随程潜起义的前前后后..... 萧作 霖(63)
- 陈明仁长沙起义侧记..... 吴相 和(76)
- 湖南起义杂记..... 李维 城(84)
- 抗日战争时期蒋美勾结与矛盾..... 杜建 时(96)

抗日战争时期的“皖南事变”史料

顾祝同的反共军事阴谋

岳 星 明*

顾祝同等早已蓄谋制造反共的“皖南事变”。一方面，他们虚伪地对外表示“用人格担保”，“保证尽力掩护新四军北撤”。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掩护北撤”的美名下，早已调兵遣将，重重包围，并且有计划地制造和散播新四军将要“南窜”、实行“三山计划”的谣言，以欺骗蒋军官兵、推卸事变责任。最后，他们把新四军按照规定路线（先向南经旌德再转东）北撤，说成是“南窜”；把早已蓄谋的围攻说成是“自卫还击”，制造了这一血腥事变。我当时虽也参与戎机，作了帮凶；但经过十多年来党的教育，才认识到这是蒋介石、顾祝同等有计划制造的罪恶阴谋。现将我当时所了解的一些情况记述如下：

一、调兵唯恐不多、不精

在一九四〇年十月以前，新四军在皖南地区万余人的部队，除了正面抗击芜湖、繁昌一带的日寇以外，三面均已受蒋军共四个师的防范、监视。计右有东北军的一〇八师（师长戎纪五），后有“中央

* 岳星明当时任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少将参谋处长。

军”的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左有川军一四四师(师长唐明昭)和一四五师(师长孟浩然);蒋军兵力已不下四万之众。

该年十月下旬,顾祝同在接到何应钦、白崇禧“皓电”后的第二天,即在长官部例行的汇报会上,指定我拟出调集兵力的计划。当时顾祝同指示说:“新四军要渡过长江,困难不少。我们要抽调必要的兵力,掩护他们通过日占区安全北撤。同时也要考虑到,他们可能不遵守命令,反而向南、向西‘流窜’,我们也需要增强皖南的兵力,作堵击的准备。部队还要选好的才顶用。参谋处应按照我的这个意思,拟出计划送我核定。”

我当时认为:新四军北撤路线,从湖口至南京之间渡江势不可能;以先向南经旌德转向东进,经宁国南侧,广德、郎溪之间,再经金坛、句容之间,从镇江以东渡江为最适宜。“掩护”北撤只要调增一个师,而防堵“流窜”的兵力,至少要调增两个师。当时,三战区的兵力无多,除了可以调用战区控置的川军一四六师(驻赣东乐平)外,只好从浙东抽调七十九师前往。当我将这些意见向顾祝同报告时,顾大体同意,并答应亲自打电话给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同黄商调七十九师。不过,顾又着重指出:“一四六师可以调去,但装备差,怕不顶用,不要放在第一线。你再研究一下,应再增调一个师前去为好。”这时,我想只好打四十师的主意了。该师是由在海州的税警总团改编的,装备较好,配有德造卜福式的山炮。经我提出后,顾祝同立即说:“很好。你就把四十师列入计划,并且要用在第一线。”

于是,根据顾祝同的这些指示,我拟出了一个防堵计划,经顾祝同核定,分别下达。大要如下:

(一)新四军北撤路线为:旌德、宁国南侧,广德、郎溪间,金坛、句容间,并从镇江以东渡江。

(二)抽调诸暨方面的七十九师开往皖南太平附近,由浙东后方抽调一个暂编师前往接防。

(三)五十二师和一〇八师应缩短正面,集结兵力,加强机动作战力量。

(四)电催四十师兼程西开,预定开旌德、三溪和太平以东的地域,归第三十二集团军指挥。

(五)一四六师开皖南的休宁、屯溪间地域控置。

为了调集更多的兵力,后来顾祝同又指示从浙东抽调六十二师开皖南旌德附近,并请调原在第九战区的十九师(师长唐伯寅)开往皖南。后因战斗结束较快,六十二师只开到一个团,十九师只到达鹰潭地区,实际上都未参加作战。

二、早就设法选派上官云相前往指挥

上官云相的三十二集团军总部,原设在赣东的临川,指挥有刘雨卿的二十九军和刘多荃的四十九军,担任对南昌日寇的防御。在一九四〇年夏二十九军被撤销后不久,顾祝同就指示我说:“赣东只有一个军,上面没有设立集团军总部的必要,应将三十二集团军总部调往皖南。”

当时,按理皖南有一个二十三集团军总部就已尽够了;而赣东接近南昌之敌,赣江两岸又同九战区分界,需要有一个较高级的司令部,以便协同作战。记得我曾签具意见,建议浙东、皖南、赣东各设一个集团军总部坐镇为宜。但顾祝同又以需要加强苏南敌后工作为借口,仍要参谋处按已交代的办理。结果,两个集团军的总部同挤在徽州(后来三十二集团军总部才迁往宁国);三十二集团军总部在皖南所指挥的,最初也只有一个二十五军。

同时,顾祝同对皖南的川军很不放心。二十三集团军总部的参谋处处长周某,据说是共产党员,被查出后杀害。五十军军长郭勋祺因驻地接邻新四军,同新四军人员有些来往,被调离部队,送往陆大。旋派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吴鹤云为二十三集团军参谋长,派军务处课长卢荣光为五十军参谋长。这些都是一九四〇年夏秋之间所作的人事调配。

三、诬蔑新四军将要“南窜”，实行“三山计划”

顾祝同在调兵遣将的同时，竭力诬蔑新四军无意北撤，将要“南窜”。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以来，战区长官部不断有“情报”说：“新四军北撤是假的，真的是要搞‘三山计划’，即‘南窜’黄山、天目山、四明山，作为根据地。”在长官部汇报时，顾祝同也经常强调这些“情报”，督促有关方面加强防范。除了军事方面按此设想部署以外，行政方面还通报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皖南行署主任张宗良等有关地区“严加防范”。

我们当时对于这些“情报”都是深信不疑的。现在看来，顾祝同等反动派故意制造和散播这些谣言，无非是便于在此烟幕之下进行围攻的军事部署，并在打响之后颠倒是非、推卸责任，这实在是一个用心狠毒、极其卑鄙的阴谋。

四、扣发新四军弹药补给

在此期间，新四军曾两度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来上饶，要求确定渡江路线并尽快补给粮弹器材，以便早日完成渡江准备。顾祝同曾吩咐我同袁具体商洽。关于北撤的路线和渡江的地段，均经我同袁初步商定（路线如同前述不变）。对于粮弹补给，我曾大体按照袁所提出的数量，签请顾祝同批示。从顾的批语看来，他对粮食器材考虑不多，大体如数批准，独对弹药十分审慎，甚至再三斟酌，每次都续有削减。顾还不止一次地对我 and 兵站总监缪启贤说：“粮食可以分批拨给，按照批准的数量，在北撤的路线上代屯，器材也可以这样办，弹药则不发。可以告诉他们，为了减轻北撤的负担，待第一批部队越过日军防线后，再将弹药拨交后续部队领去，这样比较稳妥。”我当时也是相信新四军会搞“三山计划”，怕弹药早给、多给，将来“担当不起”，于是总是多方借口，迟迟不发。只是在事变前不

久，袁国平第二次来上饶催发时，顾祝同才批给了少量的弹药，这大概一方面由于无可推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麻痹新四军吧。

五、赶修重庆、上饶之间的长途载波电话线

上饶距重庆较远，通话要经过泰和、赣州、衡阳、桂林、贵阳等处接转，不仅声音不清，且易泄密。自一九三八年成立第三战区和一九三九年初长官部移驻上饶以来，从不采取改善电讯的措施，只靠电报联络。但从一九四〇年秋起，在长官部每星期二、五两次的汇报会上，每次都增请东南电政特派员赵曾珏列席，并由赵向顾祝同报告重庆至上饶之间的长途载波电话线的备料和施工等情况。每在赵提到材料有困难，施工较慢时，顾祝同催逼很严。记得在事变前的一个多月，曾有两三次声色俱厉地斥责赵：“如果不能按照限期完工通话，要你负责”，甚至说“要杀你的头”。这条电话线总算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中旬完工。后来我听顾祝同的随从副官徐延辉说，自电话线修好后，顾多在夜间从家里同蒋介石直接通话。当然，这些都是同他们蓄谋制造这场大屠杀分不开的。

六、上官云相秘密回上饶和参加徽州军事会议

大约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间，上官云相秘密从皖南来到上饶。上官云相自一九三八年底划归第三战区指挥以来，时常来到上饶，来时多住在长官部副官处处长茅迺功的家里。除了茅家住宅宽敞、饮食讲究之外，更主要的是因为上官云相嗜吸鸦片烟，茅也是瘾者，住在茅家比较方便。上官每来必有宴会打牌、酒食征逐，我也常去参加。独这次上官之来，住在顾祝同家中，并且只住一宿，翌晨即赶返徽州，我和长官部的许多人对他的来去都不知道（我是事后才从长官办公室主任朱华那里得知的）。没有几天，就爆发了“皖南事变”，难道这又是偶然的吗？

到了事变前夕，顾祝同更要上官云相统一指挥包括唐式遵在内的皖南蒋军。约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底，顾祝同亲自打电话找我，要我到他办公室去。我到后，见战区参谋长邹文华、江苏省主席王懋功、办公室主任朱华、情报室主任卢旭已先在座。顾祝同说：“对新四军不论‘掩护’北撤，或者防堵‘南窜’，都需要统一的指挥。唐副长官资历较深，早就在皖南指挥；上官副长官资历较浅，又后去皖南。你们看，那一个统一指挥好？”在座的都是老奸巨猾，不肯发言。我考虑这是参谋处的职责，当即提出：“上官副长官资历虽较浅，但能力较强，指挥原有的五十二师、一〇八师和新增的四十师、七十九师也较适宜，可否委曲一下唐副长官？”在座的也都同意我的意见。最后，顾祝同才说：“我也是这样考虑的。”并嘱我在他的办公室立即草拟调整指挥系统、作战地境的计划，亲自誊正、盖印、加封。文件准备好后，顾祝同又对我说：“我已在电话上告诉过上官副长官，要他明天召集有关的师长以上人员在徽州开会，你带着这个计划去代表我宣布。如果唐副长官方面有什么意见，你们是四川同乡，可设法向他解释解释。我已派了一辆小汽车，你不要带任何人，明晨出发，务必当天赶到。参谋处的人员你也不必告诉他们。”

翌日傍晚，我赶到徽州西边的岩寺（这时三十二集团军总部已推进至宁国以南的万福村，岩寺是三十二兵站分监部）。我先见上官云相，上官对我说：“召集的人员都已到齐，就等你到后开饭，饭后开会。”

到会的人员，除上官云相和我之外，现记得的有：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五十军军长范子英、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四十师师长方日英、七十九师师长段霖茂、一四六师师长戴传薪、上官云相的参谋长陈以忠和三十二兵站分监李锡庆、二十三兵站分监郭叔皋等人。一〇八师师长戎纪五因在宁国前线，一四四师师长唐明昭因在南陵前线，新七师和川军二十一军因关系不大且路途过远，均未邀出席。

当晚八时左右，由上官云相主持开会。他首先说：“新四军北撤

的可能较小，‘南窜’的可能较大，会议是奉顾长官的指示召开的，现由岳处长传达顾长官的指示。”我在传达中说：“顾长官有指示，新四军如果北撤，我们要‘掩护’好；如果‘南窜’，我们要堵止住。无论如何，皖南必须统一指挥。唐副长官担负的正面已宽，责任已经很重；所以，这次打算暂由上官副长官负责统一指挥。”接着，我宣布了长官部调整指挥的计划。我虽假意征求唐式遵、范子英等人的意见，大家当然都唯唯诺诺，未表示什么不同的意见。不久，会议即告结束，各部队长当晚或翌晨均分别返防。上官云相当时对四十师、五十二师、七十九师的部队长均另“面授机宜”，我没有参加，也不了解内情。

七、打响以后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拂晓，我尚未起床，忽接顾祝同亲自打来的电话说：“接到上官副长官的电话，昨日新四军向南移动，不听制止，半小时前竟向我前线部队开火，他们为了‘自卫’，已经‘还击’，四十师方面打得比较厉害。我已命令上官副长官转令前线部队，务必要把新四军堵住。你赶快拟一个‘自卫还击’的命令给上官总部，并转报军委会。”

这次事变，由上官云相全权负责指挥，是卖尽了力气的，战区只派一联络参谋及时报告情况。事后闻其总部人员谈到，在战斗最紧张的七、八、九、十等日，上官在宁国南边的万福村，夜以继日都躺在鸦片灯旁边，床边安放电话，靠鸦片烟提神，精心策划这场血腥的大屠杀。

战斗经历一个星期，至十三日基本结束。后来，在“经验”总结中，除了吹嘘、表功之外，有下列一些情况亦可供研究当时新四军不幸遭遇的参考：

（一）新四军主力突围的方向，正对着最强的四十师。在皖南蒋军七个师中，四十师装备最精，战斗力最强，并配有德造卜福式

山炮，占有险要隘口。因而，新四军几天反复冲击，甚至一天冲锋七、八次，据说项英副军长还亲率教导团冲锋，均未能突破，还遭受很大的伤亡，使战斗力大受影响。

(二) 新四军分散突围的时机过迟。可能是在主力突围受挫之后，才决定分散突围的。这时，战斗力已大为削弱，包围圈又已压缩得很小，火力可以交互穿射，突围当然很困难了。

(三) 天时不利。在战斗期间，大雨小雨几未停过，地形又是山势陡、坑谷多、道路少、隘路多，到处山洪暴发，隘路、坑谷成河，使机动大受限制。同时，正值月令下旬，天黑无月，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新四军所擅长的夜间行动也无从发挥。

(四) 由于顾祝同扣发粮弹，战至最后已是粮尽弹绝。

一九六二年

上官云相袭击新四军的经过

武之棻*

一、事变前的一般态势

一九四〇年十月初，日寇一一四师团和二十二师团分别由京沪杭铁路线上出兵，窜扰苏南、皖南地区，至十月下旬会合于泾县后又返回芜湖，十月底全线又成对峙状态。当时，国共双方部队的态势如下：

新四军于一九四〇年时位置于泾县西北的云岭附近，建有抗日游击根据地，军部在云岭，归蒋军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指挥，担任苏南、皖南沦陷地区对日寇的游击作战。其编制装备与兵力部署等，一概不了解。由云岭经泾县五十二师师部再至宁国三十二集团军总部，仅有一条单话线，电话不能畅通。无线电有联络，来往通报也很少。

蒋军方面：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原在江西临川指挥对南昌方面日寇的作战。一九四〇年十月初调到皖南宁国，总部住城南万福村，接任苏南、皖南“抗日”作战的指挥任务，所指挥的国民党部队如下：

(一)第二游击区总指挥冷欣(兼任苏南行署主任)，辖有：第六十三师(师长冷欣兼)，挺进第二纵队(司令顾心恒)，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独立三十三旅(旅长黄镇中)，苏保一纵队(司令

* 武之棻当时任上官云相的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少将参谋处长。

单栋),第四十师(师长方日英,隶属二十五军建制),新七师(师长田钟毅,欠一个旅,原属五十军)。占领泗安、张渚、溧阳、梅渚、郎溪之线守备,右与浙西第一游击区、左与第二十五军衔接。总指挥部在山丫桥。

(二)第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辖有:第四十师(暂配属于第二游击区),第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第一〇八师(师长戎纪五)。占领宣城以北之团山至马头镇以北杭琅山之线守备,右与第二游击区、左与第二十三集团军衔接。军部位置于山洞。

(三)新编二十一军军长范绍增,只有一个二十一师,初由战区调来,住宁国河沥溪,十一月间加入第二游击区作战。

二、逼迫新四军渡江的阴谋

上官云相在一九四〇年十月初到达宁国万福村,接替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王敬久的指挥任务。当时正逢日寇在苏南、皖南地区大举窜扰,及至十月底各部逐渐恢复原来防线后不久(约在十一月初),有一天晚饭后,上官云相对我们这些高级幕僚得意洋洋、谈笑风生地说:“我这次被调来皖南,主要是这方面战场辽阔,部队复杂;忠义救国军是帮会起家,只听戴笠指挥,不服战区调遣;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队伍,名义上归总部指挥,实际上只听共产党的指挥,对总部及战区什么表册战况都不报来。我的副总司令王敬久资历浅,连冷欣在内也不服气,当然搞不好。来时我经过上饶,三战区顾长官(指顾祝同)对我说:‘敬久在皖南驾驭不了,纪青(上官别号)你去指挥一定能搞得,况且你和叶挺是保定军官六期同学,你有办法指挥他。’顾长官都是把困难的局面交给我办。军人吆,也应为党国、为长官分忧,否则算得什么将领呢?不几天我要亲到各部视察,了解下情,并向他们打打气。”

十一月初(四、五日间),上官云相率朱高级参谋和我及副官警卫等出发视察部队。第一天至河沥溪第二十一军范绍增的军部,第

二天中午到柏垫忠义救国军周伟龙的军部，晚至广德田里戈村第二游击区冷欣的总指挥部。住一夜，次日派我和朱高级参谋分至第一线视察具报。上官云相即返回宁国总部，不久又到第二十五军视察，并电叶挺将军，大意是：“我本想在视察二十五军后，再到云岭视察新四军，因相距甚远，往返费时，请你前来周王村适中地点一晤。”约在十一月十五日前后，上官云相偕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保定军官八期）、一〇八师师长戎纪五（保定军官九期）先一日抵周王村，次日叶挺将军先至五十二师师部由师长刘秉哲（黄埔军校三期）陪同前来。开会两天，各自回部。我至溧阳视察四十师再至梅渚视察挺二纵队经郎溪回至总部时，上官云相亦由周王村回部。次日在幕僚会议时，上官云相说：“在周王村我向叶挺提出军事委员会会有命令，着新四军于一九四〇年底以前全部开过长江以北，希望他能遵期过江。行进路线最好是从现在驻地直接向北，在芜湖以西荻港附近过江到无为（三里店至荻港为三十二集团军与二十三集团军作战地境线）距离最近。需要我协助的事情，我尽力帮忙。”（大意如此）又说：“叶挺表示意见：‘（一）已奉到上级的命令要新四军在一九四〇年底以前开过江北；（二）渡江地点希望能从镇江渡江开往苏北。开出守备线进入沦陷区的路线，须经泾县、宣城以南，溧阳以西，向北开出守备线，进入沦陷区金坛、溧水的山区（按即大茅山）地带；（三）先将后方机构、修械所、被服厂、印刷所、伤兵医院及眷属等等非战斗人员撤走；（四）请提前发给三个月经费、粮弹、电料、医药器材，以便早日开始行动。’我说很好，这些我都负责，你把各种表册及数量报来，我负责替你催请。你愿意从镇江渡江也可以，行进路线最好是从驻地往北，由马头镇开出守备线，经宣城以北开往镇江，你先派人侦察，这个好商量。”

以后，上官云相对幕僚指示：“关于新四军行进路线，参谋处先拟出方案以便抉择；军需室为他们催请经费，粮秣可请发至一九四〇年底，以后发给代金要他们自行就地购买。可是，经费必须尽快催请发给，好显出我是真诚替他解决困难的。至于械弹、电料、医药

器材等，请也请不下来，也就不必费事去请了。”

不久，为新四军请准经费五百万元法币（此数记不甚清），粮秣发到年底，别的什么也没有。行进路线定为经由泾县——周王村——黄渡镇——誓节渡至竹箐桥进入沦陷区，路线两侧十里以内可以通过并宿住，不得越出线外，以免发生误会。但这只限于非战斗人员，至于战斗部队仍坚持要从驻地向北就近进入沦陷区。又令各部队沿途派员以招待为名，暗中侦察经过的人员数目，运输物品的品种数量，逐日具报。当时所报，确有新四军后方非战斗人员陆续经过，每次百余人或数十人为一队，所运物品，多为印刷所工具，被服厂工具材料，也有眷属及伤病人员。据我回忆，总数不超过二千人。

在十二月初，上官云相以送亲笔信为由，派少校情报参谋闻援（康泽所办的星子训练班毕业，曾在别动队工作过），前往云岭新四军军部为联络参谋，借以探察新四军实力。先此，第三战区长官部已派有中校情报参谋陈淡如（军统特务）住新四军军部为联络参谋。

三、徽州秘密军事会议及以后的具体部署

约在一九四〇年底，顾祝同派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长岳星明，在皖南徽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参加的有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第二十三兵站分监郭叔皋，第三十二兵站分监李笃忱，皖南行署主任戴戟，国民党皖南党务专员张超等人。会议目的是：如果新四军不能于一九四〇年底以前开过江北，决用武力消灭新四军。主要研究事项是对付新四军的指挥官人选及兵力编组问题。

按新四军所驻位置（即预期作战地区）是在第二十三集团军作战地域线内，理应由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担任指挥。但顾祝同早已预定要上官云相担任作战指挥，要使唐式

遵面子上过得去，又肯派出部队参加，这是会议上要做的工作。商议结果：（一）仍照顾祝同的预定，由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担任消灭新四军的作战指挥，为了对外保守秘密和避免舆论指责，不另设名义和机构。（二）使用兵力除指挥原有第二游击区及第二十五军外，增加第二十三集团军所属的第五十军和第七十九师（由战区派来开至太平）、第六十二师（由第一游击区抽调开至宁国）。（三）第二十三分监及第三十二分监分别担任补给。（四）其他党务及行政各作必要的准备。必须说明的是：第五十军没有军长（原任军长郭勋祺因受排挤，名义上升为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送陆大上学，后来又与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刘雨卿对调），研究结果由刘雨卿组织指挥所兼代第五十军军长，参加作战。

以上情形是上官云相会毕回部后口述的。当时，他很得意地说：“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顾长官早就打算好了，才调我到皖南来担任这个任务的。我的总部可以说是最现代的兵团指挥机构，自己没有私人的基本部队，但是指挥哪个部队都能作战，唐式遵他就办不到。”

又说：“当前这种情形要绝对保守机密，对新四军方面仍代他催请经费粮秣，使他早领到手；磋商渡江地点及战斗部队行进路线一节，赶快办好，希望他们能遵令过江。对于弹药器材决不代他们请领，不能让他们用我们发给的弹药来打我们。”

又说：“将四十师由第二游击区抽下来，先开至宣城以南机动使用”（以后改开旌德以北的三溪镇）。

又说：“我的作战要旨是：如果新四军不遵令于年底以前渡江，决以优势兵力加以包围消灭。指挥要领是：压迫北开，俟其越过守备线，即严阵不使再退入守备线；大部队渡江，必遭日寇袭击消灭。新四军如在云岭按兵不动，则就地包围，坚决消灭他。你们研究准备吧！”

当时，对于新四军的编制、装备、兵力、部署等，均不了解。有的说：“游击部队，还不是破枪烂炮，中央（指重庆）根本没有发给正式军队装备，实力不强。”有的说：“新四军从陕北领到很多苏联新机枪、小

炮，新式电台，很多手枪都是二十响的驳壳，近战火力很强，但是缺少大炮。”这些都是传闻和猜测，没有确实的资料和可靠的情报。

在十二月下旬，派往新四军的联络参谋闻援，匆忙回部，偷得新四军兵力部署图稿一纸(旧的)，得悉新四军下属十个支队，除第一支队在苏南大茅山附近，其余九个支队均在军部周围附近，每支队千人上下(支队编组武器多少仍不知道)。这时才第一次能对新四军的实力作出判断。当时判断：新四军各支队，连同军直属部队及非战斗人员在内，总共约有一万四五百人。在大茅山的第一支队一二千人，经常在日敌后方游击作战，战力必是较强的。十二月以来泾县、周王村、黄渡镇、誓节渡、竹箐桥进入沦陷区的军部非战斗人员计有二千余人，现留在云岭附近的兵力约万余人(均系战斗员)。蒋军方面，当时认为：按日寇作战规律，每季必来“扫荡”一次，必须抓住这个间歇时期，以迅雷之势一举消灭新四军，战斗日期不能拖长，拖长有变，与蒋军不利。在兵力调配上，当时作了如下布署：第二游击区抽出第四十师后，其余各守原防，尽量多控置机动部队，准备应急使用。第二十五军的五十二师和一〇八师，各仅留少数的一部对日寇监视守备，抽出主力准备对新四军作战。第五十军的一四四师、一四五师以及新七师之第二旅，各留一部仍归该军部指挥，对日寇监视守备，抽出主力由刘副总司令雨卿指挥，准备对新四军作战。另加第七十九师(开太平)、第六十二师(开宁国)参战，可使用的兵力为七个师又一个旅。按可调出三分之二计算，每师为七千人，旅为三千五百人，共计约五万二千五百人。装备武器当更优于新四军。当时规定：在一九四〇年底以前，决不能暴露对新四军备战的迹象，各军只能秘密作准备，并在年底以前准备完毕。上官云相还指示：“第四十师应即开至三溪镇，速派便衣人员向北侦察，更要保持秘密，万勿暴露企图，以免给予新四军口实。”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左右，根据上述情况下达命令、完成编组及各项准备。

刘副总司令指挥所设在太平，将太平经旌德至绩溪的长途电